

西藏和平解放的农奴制因素与内向力量^{〔*〕}

○ 李荟芹

(西藏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在地缘政治的视角下,西藏的战略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开始把西藏问题纳入到中国革命的视域中来思考。解放西藏是坚定不移的,但是选择何种方式解放则是需要酝酿考虑的。随着中共对西藏社会的深入调研分析,最终农奴制和内向力量成为中共选择“和平”方式解放西藏的最为关键的因素。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政教合一;农奴制;内向力量

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国境线长3842公里,占全中国的16.85%。对于中国来说,西藏既是西南前哨,又是后方屏障。它雄踞青藏高原,俯瞰南亚次大陆,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谁掌握了西藏,谁就可以控制喜马拉雅山麓地带;谁控制了喜马拉雅山麓地带,谁就可以威胁印度次大陆;谁能威胁到印度次大陆,谁就能把手伸到南亚的任何地方,进而可以触及全亚洲”。^{〔1〕}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国家安全方面更是有着非凡的意义,“考虑到西藏与新疆、青海、云南和四川四个省毗邻,同时又与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的阿鲁纳恰尔邦交界,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敌对国家想影响西藏或者在西藏建立势力范围的企图,都意味着不可接受的威胁”^{〔2〕}。解放战争后期,中共开始把西藏问题纳入到中国革命的视域中来思考。解放西藏虽然是坚定不移的,不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解放则是需要酝酿考虑的。随着中共对西藏社会的深入了解,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

作者简介:李荟芹(1977—),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藏近现代史研究。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藏和平解放时期中共对西藏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研究”(编号:15XDJ003)阶段性成果之一。

因素和内向势力最终成为了中共选择“和平解放”西藏的最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导致下层民众反抗意识薄弱

“时代的潮流到处都在演变,唯有在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停滞不前。”^[3]近代以来,西藏面对现代化世界,但却拒绝任何变革,呈现出一幅停滞、衰败、封闭、落后、贫苦的“中世纪”景象。

旧西藏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地区。“西藏的政治是依托于宗教之上的”,也就是说西藏的政治运行是以维护宗教为目的的,“教为先,政附焉,这应当是西藏的政治理论”^[4]。西藏统治的实质是“假封建制度的手段,以维护其宗教至上的目的”^[5]。换句话说,西藏的政治体制就是为了维护西藏的宗教,宗教是西藏唯一的意识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西藏人认为正是他们的“政教合一”农奴制才成就了西藏举世无双的地位,这种自信根深蒂固。“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获得了空前的财富和权力,但是致力于全人类幸福的却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珍爱政教合一系统的宗教乐土西藏”^[6]世界上可能再也没有哪个地区能像西藏一样将政治与宗教结合的如此紧密了。“在亚洲广阔的群山与荒漠之间建有一个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宗教王国,那是喇嘛们的天下。尽管小规模革命曾将宗教和世俗权力多次分离,但是两者最后还是一次次地重新结合。没有哪个地方像那里一样,国家的整个宪法都基于掌握皇权的高级僧侣集团之上。依照释迦牟尼和佛陀的灵魂转世说,大喇嘛死后能转世成新喇嘛,并尊为神圣的体现。在神圣的明确秩序中,从大喇嘛往下构成了喇嘛的层层链条。在这个地球屋脊之上的各个教义、教规和设施中规定的僧侣统治,如此牢固,鲜有出其右者”^[7]。

每一种政治体系都会提出一种专门的意识形态来概括和合理化自己存在的基石,“在西藏,社会和政府的基石是一种认为宗教目标和活动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价值体系”^[8]。西藏宗教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宗教成为政治权力运行的指导思想,宗教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成为唯一的意识形态。著名藏学家柳陞祺说:“西藏被人民称之为宗教之邦,是因为喇嘛教、喇嘛寺院和喇嘛已经渗入到西藏的一切事物之中,可以说在西藏任何事情都是以宗教开始,并以宗教而告终”^[9]“宗教对于西藏人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特别是建立了僧人政治后几百年里,情况更是这样”,^[10]在西藏“唯独宗教才是西藏人的头等大事”^[11]。

“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不仅为精英们提供了丰饶的财富和资源,最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被束缚’的劳动力”^[12]旧西藏有两大对立阶级:一个是占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寺院上层。官家是指西藏地方政权中的僧俗官员;贵族是指元、明、清历代王朝册封和各世达赖班禅喇嘛等分封的世袭贵族、牧区的世袭千户、昌都地区的土司、大头人等;寺院的上层主要是指寺庙中的活佛、堪布等上层僧侣。这部分约占西藏人口的2%,却几乎占有西藏全部的耕地、牧场、森林、山川以及大部分的牲畜农具。三大领主一般不亲自经

营管理占有的农庄和牧场,而是委派一些人员代为管辖、经营,这些人统称为农奴主代理人,属于农奴主阶级的一个部分,约在西藏人口的3%左右,直接统治和剥削农奴。另一个是占人口95%的农奴阶级:差巴即领种份地(差地)的人;堆穷即小户;朗生为家内奴仆和奴隶。此外还有寺院中贫苦僧人、尼姑和城市内的乞丐。在西藏“人不无主,地不无差”。从领主的立场来看,这个体系极其高效,领主们无需为了获得劳动力而互相竞争,更无需操心劳动力的吃饭生存问题,只要派管理人员来组织农奴劳动,收取高额的“差役”即可。

农奴生活水深齐颈,任何一个细浪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沉重的徭役还常常迫使他们在农忙时节离开田野,这些无偿的义务,实际与一切压在藏族人头上的其他重负并无区别。到处都在为官府施工,修筑道路,建造房屋等等,五花八门。所有这些繁重的劳役都压在可怜的村民身上,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这些可怜的人只能永远呆在他们贫瘠的土地上,他们完全失去了一切人的自由,一年比一年更穷,此生似乎也无解脱的希望”^[13]。为了维持生活,农奴不得不借高利贷,“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再借……如此下去,年复一年,永无完结,直到临死他们也不能从债务中解脱出来,而这些债务就落到了他们儿子的身上,可怜的儿子在刚一出生起就要受到这些祖传的债务的压迫,而这些债务的起源早已是遥远过去的事了,他根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说起”^[14]。直到西藏和平解放,这种贫困依然让人触目惊心,“大人无论男女都蓬头垢面,衣着褴褛。小孩们全身赤裸,一身油黑,似见黑色人种,而四肢干瘦,鼓着大肚皮,像佛寺笔画‘轮回图’中地狱里的饿鬼。见此情景叫人不寒而栗”^[15]。而农奴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极力提倡因循守旧的思想意识,以不变应万变,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生事物”^[16]。

西藏是一个传统的宗教神权体制地区,佛教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支配着全民族的世界观。喇嘛、活佛和寺庙领袖的声望地位非常高。藏民将全副心思都投入到了转世来生,就没有心思来反抗和改造自己所处的社会了,“藏传佛教很有效地在下层百姓和穷人中培养出了一种消极的政治观,大众对变革的呼声很小”^[17]。“宗教特权和声望以及大寺院的利益扮演了一个主要的障碍角色,束缚了西藏政府的手脚,阻碍了改革”^[18],导致西藏停滞不前。

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农奴制,社会落后封闭,宗教氛围浓厚,几乎人人信教,导致民众的宗教意识浓厚,阶级斗争意识相对淡薄,下层民众还不能够起来推翻上层统治。西藏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不仅掌握着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军队、粮食、生产工具等主要社会资源,垄断着一切对外界的关系和信息交流,而且还通过宗教从精神上控制着下层群众,下层群众也因宗教信仰对上层人士顶礼膜拜。同时,在近代发生的三次大规模的康藏冲突中,西藏上层人士在宗教的号召下领导下层民众反抗汉族的民族压迫,使西藏内部的联系更加紧密。因此,西藏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还是绝对的领袖和权威,拥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动员能力,他们几乎完全操控着下层民众的利益。旧西藏的社会境况,使中共清楚地意识到,想要发动

西藏的农奴起来推翻自己顶礼膜拜的宗教制度,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起码在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可能的。考虑到西藏下层民众的特殊性,在西藏进行阶级斗争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中共考虑和平解放西藏,争取和团结占人数极少的西藏上层分子。

二、西藏根基深厚的内向力量成为中共和平解放的内部动力

13世纪中期,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此后600多年里,虽经历元、明、清三代,西藏政教势力也几经更替,但西藏社会一直内向,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央政府的统治和管辖。19世纪后期,英国率先入侵西藏,并在西藏培植外倾势力,遂使西藏成为“问题”。自此,内向、外倾两种力量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影响和操控下,相互博弈,此消彼长。

清末藏制改革,触动了西藏上层分子的利益,“不适合拉萨大多数管理之脾胃”^[19],激起了西藏上层人士的离心。于是西藏上层利用“宗教”开始做文章,大肆宣扬赵尔丰捣毁庙宇、残害喇嘛的恶劣行径。英国紧抓这一良机,极力拉拢讨好西藏上层人士,十三世达赖的态度也从仇英逐渐转向亲英,藏独势力渐长。达赖对于独立始终犹豫不决,“英人见达赖始终不忘祖国,欲密谋以倾覆之。”^[20]转而扶持藏军中的少壮派军官,这些人在接受英式军事训练的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他们认为想要保卫西藏的安全,必须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不是依靠喇嘛们的祈祷。这当然不是喇嘛们所期望的,尽管这只军队可以保护西藏政府对抗中央政府,但是它的存在威胁到了西藏宗教的至尊地位,他们甚至想要政教分离,让达赖只当精神领袖,这更是喇嘛们绝对不能容忍的。因此十三世达赖果断粉碎了英国的阴谋。热振时期,与中央联系密切,内向力量增强。后达扎上台,与帝国主义联系密切,西藏处于分裂的边缘,但是西藏一直没有脱离中央的统治,主要是西藏内部还存在着一定的内向力量,对外倾势力起到了关键的牵制作用。

在中原文化中,中国是宇宙的中央,据“中央”就可统治“八方”,历代统治者都视“国家统一、四海归一”为己任。同时统治者也认识到边疆地区与中原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因此一直对边疆地区采取了比较务实的“因俗而治”,即周边少数民族承认中央王朝的统治,中央王朝任命少数民族的首领或部落酋长为本民族的统治者,给予相当的自治权力,不改变其生产和生活方式,允许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宗教信仰,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等。但是这样也带来一个后果就是中央政府权力无法有效控制边疆基层社会。因而一般在中央政权改朝换代之时,边疆地区都会有一段时间处于失序、观望状态,但是随着中央政权的重新建立和稳固,少数民族政权就会恢复到正常的秩序。西藏较其他民族更为特殊,交通不便,偏安一隅,长期“因俗而治”,而且宗教气氛浓厚,民族结构单一,与其他民族交往甚少,自治权力相当大,在辛亥革命到和平解放这几十年间,中央政权交替更迭,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一直处于时断时续、若即若离状态。

尽管1912年以后西藏与中央的关系很松弛,但在长期的“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西藏的“内向”心理还是存在的,而且保持着一定的惯性和定势,根植于西藏广大民众的心里。“西藏虽然倾向自主,尚不欲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的中国完全分离”。^[21]西藏农奴在受到藏官严重的剥削时,他们还是“愿中国之复还”^[22]。藏民中甚至有“一个好藏官不如一个坏汉官”的说法。民国黄慕松进藏时,看到“西藏人民自达赖对中央携贰以来,政治黑暗、战争频仍,苛捐负担太重,双管齐下,民不堪命,年来人口减少,生计维艰,均为中藏失和重要原因”,他“沿途见闻所及,大抵人民希望中央对藏关系早日恢复,以期战争停息,政治改良,压迫苛政可免”。^[23]倾向内地的,有学者将他们称为“内向派”,认为“中央好,即是西藏好。因为唯有中央兴隆,则西藏的佛教才会真正兴隆。”^[24]几百年的文化交流,使得西藏民众对中原文化有了一定的认同。

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西藏与中央已经密不可分,和则两利,分则两伤。192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前往南京,希望恢复中藏关系。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延续了600多年,绵长的历史文化渊源已经让民众形成了一种本能的内向心理,不可能因一时政局的动荡而消失。长期的历史交往中,藏族与汉族之间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联系。和平解放前,中共在调研中,也认为以噶伦索康、夏格巴为首的,主要是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是外向派。以阿旺坚赞(拉萨兼军务局副局长,曾任西藏驻京代表)为首的,则属于内向派^[25]。军队进藏后,需要坚定团结内向派。

宗教固有的、内在的矛盾,使得宗教势力最终是内向的,这就成为限制外倾势力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西藏几百年来价值核心就是藏传佛教,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已经深植于西藏民众的心中,内化成一种深层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深深地影响着西藏人民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于西藏人民来说,一生最大的欢喜和最大的悲伤都与宗教的荣辱息息相关。宗教可以让他们受尽折磨依然不愿意起来反抗、推翻农奴制,宗教也可以激发西藏人民的民族情绪,推动藏汉矛盾,加速西藏分离倾向。但是同样,宗教更害怕新思想、新观念的传入,会引起西藏人思想的变化,形成一股危险力量,冲击宗教至高无上的地位。十三世达赖改变对英态度正是基于此。甚至在拉萨办英文学校,喇嘛们认为“这是对西藏宗教昌隆的一种潜在危险”“对于政教来说,不论眼下还是长远去看,都是百害而无一益的”。^[26]三大寺是主要的内向力量。黄慕松进藏,就指出“三大寺拥护中央,其唯一目的在能维持其宗教,对于政权则愿意服从中央。盖以彼等受逊清二百年之厚恩,又以英人种族不同,风俗宗教各异,反视中央不惟种族、宗教相同,且征昔之汉人在藏代谋福利事实,思汉之心不忘,而愿恢复中藏原有关系,实较迫切”^[27]。为了削弱亲英势力,1939年三大寺曾派洛桑团月到重庆,请求中央“速派优良军士一千名赴藏,由三大寺给养,既可弹压亲英势力,又可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量;速派教育人才赴藏办汉文学校,使文字统一,中国人识中国字,懂中国事,不受外人分化;速派工程人员赴藏修公路,连接中枢;速派人员赴藏建

立中央银行,既可抵制外汇,又可统一法币;速派人员赴藏开设工厂。以上几点,如能照办,则亲英势力可减,英帝东占甚难,而西藏可永为中国领土,吾等永为中国国民”。^[28]其实,喇嘛们多主张内向,反对分裂,主要是认为与汉人“同种”,更有利于宗教的发展。

纵观和平解放前的西藏,随着中央政权的衰弱,西藏与中央联系相对松弛,但是对“大一统”的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感还是普遍的,这是600多年来沉淀于藏民心中的深层心理结构,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失。西藏部分当权者想要独立,但是缺乏民众根基。而这一股内向势力最终,成为中共能够和平解放西藏的内部动力。

三、中共审时度势制定和平解放西藏策略

解放西藏是必然的,但是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来解放西藏,是中共面临的一次重大考验。正如谭·戈伦夫所说“中国新政府一开始似乎并没有打算出兵西藏,虽然按照他们的军事优势是完全可能的”。^[29]1949年以前,毛泽东也曾数度论及西藏,但都只是将西藏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民族问题来对待的。1949年2月毛泽东会晤米高扬,认为解决西藏问题“麻烦”有两处(交通困难和民族问题),“必须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30],这说明毛泽东在一开始接触西藏问题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解放西藏的方式了。1949年7月,毛泽东认为“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31]。至此,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政治解放西藏。1949年第二次驱汉事件后,西藏局势恶化,国民党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人民解放军又未能到达西藏,中央政府对西藏管理成了真空,藏独分子日益猖獗,公然派“亲善使团”寻求外部支持藏独。但解放战争势如破竹,而且国际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果断调整解放序列,将解放西藏放在台湾之前,“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1949年以后,中央逐渐把“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同时作为解放全国的主要方法,这为和平解放西藏决策的提出奠定了思想基础。1950年1月2日,毛泽东正式下达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指示,并逐渐将这一指示落实到可操作的层面。

鉴于西藏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历史环境,毛泽东在一开始对待西藏决策问题上就很谨慎,认为“此类少数民族事务……中央离他们很远,不了解情况,不便处理他们的问题,故他们的一切事务由西南局和西北局处理…亦请西南局、西北局提供意见供中央采纳”^[32]。由于中央对西藏社会情况所知甚少,为此藏工委调阅了班禅驻在南京办事处的资料,随后又调集了原国民党政府满蒙藏委员会人员进行咨询研究,为了更多地了解西藏,甚至走访和拜询四川对西藏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贺龙拜访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学者任乃强教授),起初我党领导人认为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就可以了,但是随着对西藏社会的逐渐了解,认为西藏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共领导人的心理预期。因此,解放西藏“政治准备尚在研究之中,因为材料太少,知识不够,许多问题要在精细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33]

为了更仔细、更精准地了解西藏的民族、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性,

弄清楚西藏各阶层对人民解放军进藏的态度,“西藏问题(包括散布在西康、川西北及云南境内藏族问题)之许多政策,尤其是政教问题,必须多方面调查,多搜集一些材料,提出具体意见,获得解决”^[34]。为此1950年2月还特设了“西藏问题研究室”,通过询问往来西藏的商人、香客以及拉萨出来人员了解西藏的兵要地志、民俗风情,再佐以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原满蒙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回忆记述,以及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文档资料,基本上摸清了西藏的政治军事的基本情况,3个月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研究室最大的贡献是,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对解放西藏确立了一项总的原则:暂维持西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保留原有的机构,待时机成熟,再有步骤、有计划地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达到民主改革。这是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在西藏的初步形成,为“暂维原状、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路径上的抉择,随后西南局邓小平完全接受了“暂维原状、和平解放”的思路,形成了与西藏和谈的“十项条件”,最终中央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十七条协议》。

当然,这一“和平解放西藏”思路,初步形成完全源于研究室人员对西藏社会的深入了解以及对西藏上层人士心态的准确把握。他们明白,西藏上层人士大部分在观望,他们最害怕、最担心的是政教合一的农奴制度以及该制度带给他们的特权与核心利益会丧失。为此,他们找了很多借口和理由拒绝解放西藏,“拉萨寡头政权这样做是为维持现状,保护其自身的社会地位的最后努力”^[35]。西藏上层分子最关心的是自己政教特权地位和既得利益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研究室人员洞若观火,完全掌握了西藏上层人士害怕失去特权的心理,采取迂回策略,以暂时承认西藏原有制度来换取西藏主权,使西藏和平解放有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托。从中共层面来讲,主要是想收回西藏主权,保持领土完整。从西藏上层人士来看,主要想保持现有的政教合一的农奴体制以及该体制带给他们的特权。“和平解决、暂维原状”可以说完全抓住了西藏上层人士的重心和关键,迎合了广大上层分子的脾胃,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可行性。这一政策有力地保护了西藏上层的核心利益,对他们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最终促使了《十七条协议》签订,西藏和平解放。

综上所述,中共最终选择“和平方式”解放西藏,一个最为关键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西藏的农奴制和内向势力:西藏农奴制导致下层人士阶级斗争意识淡薄,很难发动下层群众起来推翻西藏统治,但是西藏的内向力量根基深厚,成为了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中坚力量,但是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最终的决策是中共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立足全局,从西藏实际出发,审时度势,综合国内外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得出的。解放西藏虽然是中国主权之内的事情,但是因为西藏地理位置特殊,而且西藏问题非常敏感,和平解放西藏,有利于稳定国际形势;国际环境有所改善,联印牵英制美的外交取得一定效果,西藏外倾势力寻求外来支持无果;西藏农奴处境悲惨,再也经不起战乱,军事解放就必然有伤亡,和平方式能最大限度减少生命和财产损失;藏汉矛盾尖锐,民族隔阂严重,

和平解决西藏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消除藏民族的恐惧心理;西藏地处内陆,交通艰险,乱石纵横、人马路绝,和平解放西藏能减少军事行动带来的补给运输问题;从西藏内部来看,西藏人民渴望回归中央,渴望得到解放,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藏军的势力根本无力和经历战火洗礼、受过正规训练的解放军一战,和平解放是得西藏人心的。

注释:

[1] George Ginsberg and Michael Mathos, *Communist China and Tibet: The First Dozen Year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4, p. 210.

[2][6][8][12][17][18][美]梅·戈尔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西藏现代史 1951-1955——暴风雨前的宁静》(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la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吴继业译, 香港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第 21 页, 引言第 1、11 页, 第 23 页, 引言第 16 页。

[3][13][14][法]亚历山大·达维·耐尔:《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内部资料), 李凡斌、张道安译, 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 1985 年, 第 90、85、71 页。

[4][5][9]柳陞祺:《西藏宗教》(下)(1947 年),《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下),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427、450、573 页。

[7]转引自汪辉:《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 三联出版社, 2011 年, 第 11 页。

[10]吴仕民主编:《中国民族理论新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24 页。

[11]沈宗濂, 柳陞祺:《西藏与西藏人》, 柳晓青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6 年, 第 118 页。

[15]彭哲:《追忆西藏岁月——回忆我在西藏的工作与生活》,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11 年, 第 32-33 页。

[16]西藏党史编辑部:《西藏党史资料》第三集, 1991 年, 第 8 页。

[19][21]牙含章:《达赖喇嘛传》, 华文出版社, 2001 年, 第 164、202 页。

[20]陆兴祺编:《西藏交涉纪要》下篇, 蒙藏委员会, 1954 年, 第 91 页。

[22]《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1963 年, 第 290 页。

[23][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事报告书》,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年, 第 72、71 页。

[24]柳陞祺:《西藏政治》(1947 年),《柳陞祺藏学文集》(汉文卷·下),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8 年, 第 469 页。

[25]黄可:《和平解放西藏重大事件实录》, 学苑出版社, 2013 年, 第 48 页。

[26]张晓明编:《见证百年西藏续——西藏历史见证人访谈录》, 五洲出版社, 2004 年, 第 37 页。

[28]西藏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编:《西藏地方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第 495-496 页。

[29][35][加]谭·戈伦夫:《现代西藏的诞生》, 伍昆明、王宝玉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 第 160、152 页。

[30][31]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第 380、399 页。

[32][33]《中共中央关于注意处理藏民部落及寺院要求的指示》(1950 年 1 月 1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 年)》,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第 56、93 页。

[34]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 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5 年, 第 7 页。

[责任编辑:陶然]